

李振声 著

诗心不会老去



李振声 著

诗心不会老去

復旦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心不会老去/李振声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6. 1
ISBN 978-7-309-11801-8

I. 诗… II. 李… III. ①诗人-人物研究-中国-现代②诗人-人物研究-中国-当代
③诗歌研究-中国-现代④诗歌研究-中国-当代 IV. ①K825.6②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20174 号

诗心不会老去

李振声 著

责任编辑/郑越文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上海市崇明县裕安印刷厂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9.875 字数 210 千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11801-8/K · 547

定价: 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谁愿意向美告别?	1
诗心不会老去	
——写在《彭燕郊诗文集》出版之际	44
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	55
坚持在差异中的写作	68
“它在要求一个对称”:王家新的踟蹰和犹豫	77
回复诗性的众多向度	104
两个“古典”,还有一个“叙事”	
——张枣诗片论	115
柏桦:笺注自己诗作的那个诗人	135
诗人陈建华	
——少年时期的肖像	155
王小妮读札	193
为诗歌中的“南方精神”进一言	215
“如果语言不能表达,就请化作歌声”	219
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中国现代诗中法国因素的若干侧面	249
孙大雨《自己的写照》钩沉	280
《梁宗岱批评文集》编后	298
后记	311

谁愿意向美告别？

舞台上留下多么丰富的空虚
我凝望着这空虚，还想长久地凝望下去。
而，垂下来的幕布，遮住了这金色的洞窟，
这美好想象的神圣宫殿的入口。
不，这个入口是遮不住的。
这不是结束——谁愿意向美告别呢？

——彭燕郊《陈爱莲》

三月二十九日中午，我从长沙的年轻朋友那里，惊悉彭燕郊先生去世的消息，一时间恍若坠入梦境，根本无从辨别消息的真幻，久久回不过神来。去年四月的下旬，我与真心敬重和喜爱诗人彭燕郊的朋友们一起，汇聚到湘潭大学，那里正在为燕郊先生四巨册诗文集的出版举办一个隆重的庆典。典仪过后，有个规模不大，时间不

长,相当朴素的研讨会。燕郊先生全神贯注地倾听着所有研讨者的发言,兴致盎然,不时插上几句思维敏捷的笑谈,即使有几位朋友,因为地缘上的亲近以及湖南人那份“惟楚有材,於斯为盛”^{〔1〕}式的文化自信,身不由己地说了些从训练有素的学术看去也许不尽严谨的话,燕郊先生也只是大度地微笑,一点也看不出年届八秩,不,年近九秩的迹象。会后,我随几个朋友去湘潭韶山和南岳衡山转了一圈,这些都是我平日不易走到的地方。离开长沙前,我又随朋友去了湖南博物馆边上的燕郊先生的家,向他老人家问安和道别,一起在他显得低洼、潮湿的家门口合影留念。我们相期一两年之后,再聚上一次、多次。我与燕郊先生神交十数年,这之前,我们一直在书信中交谈着,这次是我们第一次当面交谈,想不到竟会是最后的一次。

我没有能够赶去参加燕郊先生的丧仪,四月一日我给远在长沙的张兰欣师母和朋友孟泽分别发了信和电子邮件,给孟泽的邮件中我写道:

孟泽 我兄:

三月三十一日中午突然分别从易彬、涵之那里得知彭先生清晨遽然离世的消息,犹如遭到雷击一般,整个人就像坠入了虚幻梦境,无法辨别噩耗是真是假。彭先生的音容笑貌就在眼前,去年比现在稍稍晚些的时候,我们不是还刚刚在湘潭大学口头约好,过两年,再一起聚上一次,聚上多次的吗?这怎么可能呢?实在无法接受。

〔1〕 岳麓书院门联。

这几天惊魂一直难以安定得下来。把彭先生去年惠送我的四大卷诗文集，还有这些年陆续送我的文集诗集，一大叠信函，都摆在书桌上，翻开来，又阖上，再翻开，再阖上，什么事也做不成……

我虽无缘忝列彭先生门墙，但自结识他的十数年来，他一直是我心里最感念的少数几个老师之一。突然痛失你我思想精神上难得一遇的良师，我想，你们定会和我一样，心里生出无边的寂寞之感。先生早些时候曾对朋友说起，还有两三首长诗要写，近时给我的信中也不时说到，还有一些彼此知根知底的患难师友的怀念文准备写出，如今这些腹稿，已成为广陵散，这是最感痛惜和无可挽回的损失。他写胡风，写聂绀弩的诗文，我觉得是同类诗文中写得最动人的。他虽然没能来得及用尽他的全部心血、不世出的才情和跟真正的心灵肉体上的大悲欢缠绕在一起的思想，但还是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很厚实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将随时间的流逝越加显得珍贵。

我想重复着说，彭先生的诗心是永远也不会老去的。

我对燕郊先生的怀念，绝不是上面这样仓促间写出的短短一通邮件所能表达得出来的。我想起陈思和先生在巴金刚去世时说过的话：怀念巴金的最好方式，是坐下来，重新认真阅读他的作品。我很赞成这样的意见。此时此刻，该让心沉静下来，再次翻读和整理燕郊先生所留下的厚实的诗文遗产，然后把这份遗产放在中国现代诗史和思想文化史的系统中加以论衡，初步勾勒出燕郊先生在现代诗史、思想文化史上的贡献和意义，才是对逝者最好的一份怀念。但全面论衡和勾勒彭燕郊的意义，他的重要性与不可替代性，不是我

一己的微力所能胜任的,此文只能将我近日重读燕郊先生诗文时所引发出来的一些想法,或由以联想到的一点思路,星星散散地写下,供彭燕郊诗文爱读者推敲,并藉以表达我对燕郊先生的敬悼和怀念之情。

钱锺书先生的《谈艺录》一上来就谈到,诗分唐宋,但非曰唐诗必出唐人,宋诗必出宋人^[1]。前者指诗思、诗的情致表达上的两大类型差异,譬如说,唐诗重气韵圆融,感性丰沛,宋诗则讲究说理精微,思理深入,此类差异可以绵延和贯通在众多的时代,而不必为这两个特定的时代所限。一个是共时性的,一个是历时性的,历时性的唐宋,不足以对应、穷尽、涵盖共时性、类型学意义上的唐诗宋诗,正像宋人也可能写出可归入唐诗一类的诗,唐人也可能写出可归之为宋诗那种类型的诗。对诗说来,时间、时期和时代,还不是可以用来判断诗思、诗艺价值的最后或最可靠的依据。不过,诗虽有超越时间限制的一面,但又不得不与之发生彼此缠绕、印证的互文关系。诗发生在时间中,与时间、时代交接摩擦,诗人置身在时间、时代的巨大涡流和日常纠缠中,有所承担,也有所拒绝。因而沿循或借助时间的线索,不失为梳理诗人和他的诗作遗产的有效途径之一,虽然不必、也不便说,就是最有效的理解和诠释途径。

对于怎样界分一个“大诗人”和一个“优秀诗人”之间的区别,《诗章》的作者埃兹拉·庞德曾经给出过一个简捷明了的说法:前者需要通读其全集,而后者只要读他/她的选集就可以了。彭燕郊便是属于当代中国为数不会太多的、需要我们通读他的全集的诗人之一。

[1] 钱锺书:《谈艺录》(修订本),页1—5,中华书局,1984年。

那么,且容我沿循时间之轴,从早年彭燕郊的诗作开始我的重新研读吧。

弱冠之年的彭燕郊,毅然告别美丽的家乡莆田、厦门,辗转北行,去金华、皖南,后来又 到桂林,投身神圣的民族抗战。他在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队从事战地宣传之余,便开始入迷于写诗。他那些急就于战争硝烟中的作品,长诗《船夫与船》《春天——大地的诱惑》^{〔1〕},组诗《战斗的江南季节》等,甫一出手,便得到了包括聂绀弩、辛劳、黄源、东平、柏山、邵荃麟、葛琴,尤其是胡风在内的诗人、作家、批评家、编辑家的格外青睐。对一个刚刚出道的少年诗人说来,没有比来自自己所敬重的前辈或同道的一个赞许的眼神更让他渴望和备受鼓励的了。现在回过头去看,这些曾经替他邀得了诗的最初声誉的作品,基本上属于“青春写作”。正如作者在《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校读后记里所记述的那样:

民族的青春,自己的青春,抗日战争终于打起来了,中国大地充满激情,是那样富于诗意——生命魅力。^{〔2〕}

一方面是少年诗人耀眼的青春,另一方面则是民族生存抗争的庄严事业,是久已沉埋在历史尘埃深处的古老民族,经由神圣抗战的激发,生命活力被枯木逢春般的重新唤起,是这两者合二为一、浑成一体的产物。这样的一种写作,对身处民族青春重新被激活这一特定历史语

〔1〕 忆及《春天——大地的诱惑》的写作、发表背景,诗人这样写道:“作于 1939 年春,发表于 1940 年夏‘皖南事变’后半年多,抗议蒋政权同室操戈罪行。原稿 1200 行,胡风先生用一天的时间删改,这首诗里有他的心血。”见《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页 360,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年。

〔2〕 《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页 354—355,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年。

境的读者说来,自然格外容易被亲近和引发共鸣,激发他们重获青春般的兴奋,并且也格外为诗人自己所爱重^[1](在这个世界上,又有谁会不爱重自己的青春呢?),但同时也可能因此而遮掩了诗的真正尺度。青春,对每一个人说来,只有一次,是不可逆的。青春性写作,同样也是一次单向性的行旅,往往一闪而过,无法重复,也难以持久。但是,真正开阔的、有生命力并且达到大诗之境的诗作的形成,与其说更倚重于转瞬即逝的青春狂飙,不如说更需要倚重于持久、沉潜、毫无倦意的掘进,更属于一种需要诗人持续不断地倾注甚至耗费其一生精神、心智的劳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说,也许像《山国》,像《风前大树》《杂木林》,像《倾斜的原野》,像《叫嚣的石头》,甚至像《恶魔主义者的自白》,才是更足以标示彭燕郊早年的诗的高度的一些作品,因为与其说它们更多地依恃于无遮无拦、一泻千里的青春激情性的力量,毋宁说由于内敛和深潜,蓄势而发的诗的精神能量的聚合与发散,对读者更具持久的冲击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些诗作,彭燕郊真正确立了自己在“七月”诗派中那无人可以替代和置换的位置。诗人嗣后持续、沉潜地倾注、耗费其一生心智和劳作的诗艺诗学,它们那些基本的精神标尺和心智特征,基本上都已经在这早年诗作中现身,因而这些诗作也就更经得住后来的读者的一读再读。

《山国》《风前大树》里,树、山一类物象,不仅拥有诸如丰茂、坚实、健朗、坦然、磊落一类的风骨,而且整个形体上拔地而起的姿态,使其成为垂直轴上某种始终向上的方向指示器,加上其底部的沉厚,根基的深在,与思想、精神的超拔、深入,与人类文明所宝重的价

[1] “回想起来,大概因为年轻,写起来不知节制,如果说它还有些特点,那就是梦和现实不知道怎地结合得那么自然。不可重复的年轻岁月啊!”见《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页360,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值、意义的内核特征,均具有形式感上的同一性,彼此之间构成了恰如其分的互证、应合和对称。如此大气磅礴、挺然傲然、超拔于天地之间的物象,得以为一个终其一生格外爱重思想风骨和精神内质的诗人所倾心,那是一点都不奇怪的。

《倾斜的原野》是彭燕郊早年诗作中,为数不多的将城市意象纳入他正面抒写范围的作品之一,同样写得气度不凡。城市贪婪的进逼,导致了原野无可挽回的急速沦陷和崩塌,以及被泯灭在可悲的倾斜之中的命运;城市扬起的黄色尘埃黏附住倾斜的原野,则有如羁轭套住驮马的颈项;撕裂神经的噪音;垃圾堆,贫民窟,制革厂、屠宰场和染坊的污水;这些都还不是最致命的,真正致命的,是由这样的城市所生成的小市民、市侩的狭窄视野、低劣趣味,他们拥挤在狭小阴暗的天地里,凭藉机灵追逐财富、繁华和舒适,却对人类生命的真正的供养的源泉浑然无知。此诗对原野和城市所作的情感和价值的褒贬,似可辨认出少年彭燕郊所崇拜的诗人艾青的身影,而为他们所共同分享的诗学资源,则显然来自比利时诗人凡尔哈仑的《原野》和《城市》。当代的绿色和平组织或环境保护人士,或许不难从这首诗里找到同道和知己之感,甚至还可能会对诗人在有关生态意识上的先人着鞭而惊赞不已,追崇它为自己的先导。不过,显而易见,此诗绝不会是站在后来者吁求生态平衡立场上的一次抒写。此诗的诗旨应该别有所寓。我想说的是,此诗对市侩庸俗一面的拒斥,乃是对羁縻人内心的自由,肢解人类博大、开阔的精神视野的种种琐碎趣味的拒斥。而对开阔、丰富的精神视野的宝贵,以及坚持内心自由的不可让渡,将成为彭燕郊日后整个诗的写作历程中,或隐或现、周而复始地呈现和循守的写作原则和诗思主题。

《叫嚣的石头》写于一九四〇年代的后半期,年轻的彭燕郊在诗

中向我们出示了一种更为根本的冲动,一种从历史审视到自我审判中所生成的更高认可的冲动:

.....

这里,是话语的炼狱
在这里,我以诚挚期待灵魂的净化
我沉默,并非有丝毫懈怠
我沉默,因为我潜心于在话语的林莽里
寻觅最犀利最准确的语言,用来
加速对灵魂深处的持续掘进
我沉默,因为我专心致志于
拷问我自己

诗的高度取决于人的高度,诗的心智限定于人的心智,诗的定力来自于人性的坚定,而诗的神采则源自于人性的光耀。正如诗人在一九四七年八月作于桂林虞山庙狱中的《人》一诗中所写的那样:

桥梁一样荷负着重压的
铁砧一样经受着捶打的

人
用意志的帆驾驭风暴
以信念为形象制造发射利箭的弓

凭神圣的爱憎

人使自己发出光芒

凭勇敢和智慧

人使自己具有尊严

同样写于四十年代后期的《恶魔主义者的独白》，则从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让我们领略到了诗人内心非同寻常的道德力量，那种不怵于与黑暗对峙、进入黑暗、洞悉黑暗的道德勇气。诗中，那个在追逐一己私利和个人欲望的道路上，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不惜摒弃一切道德和良知的“魔鬼主义者”，竟是那样的大言不惭，巧舌如簧，那样的擅于察言观色和自我开脱，野心勃勃，挑拨离间，恬不知耻，蔑视和侮辱起一切属于人的正面价值来，竟是如此恣肆，无所顾忌……然而诗人心知肚明，洞若观火：此类貌似桀骜不驯，其实不过是自甘沦为可憎可厌、支离破碎的卑微欲望的奴隶。读着这些极度紧张（膨胀、恣肆）的心理和情绪的转换、变化，这些可怕又可恨的内心独白、错觉、幻觉和变态，思绪不由会被引向歌德《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或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屋手记》中的主人公那里，它们之间实在有着太多精神上的“家族相似”特征了。此诗对人性中的黑暗、卑微和荒谬，冷静、严峻到毫不手软的逼视，令人为之惊叹，从而也成功地使得此诗与那个时代曾经相当流行的、那种过于容易地表白自己的“政治正确”和道德优越的《马凡陀山歌》式的所谓“政治讽刺诗”，清楚地区分了开来。倘若没有一颗足够强壮硬朗的心，你将决计无法处理好这样的场面：人性中诡异的分裂面，人性

中的邪恶,并不在我们的视线之外,不是可有可无的,你必须正面迎上去,与它打交道。我想,在紧随其后、接踵而来的五十至七十年代,对诗人彭燕郊说来,属于他备受熬煎因而显得格外漫长的“生活的炼狱”里,诗人最终得以保持住心智的完整,应该说,拥有这样一份强健的内心依恃,是在里边起到了怎么估量都不为之过的自我支撑作用的。

一九五〇年代初,胡风用诗句宣告“时间,开始了!”此时此际,他的内心一定是被作为此一新时代的缔造者之一员的自信和自豪所充盈着的。年轻的彭燕郊同样也是以自信而又自豪的革命者身份,确信自己已经迎来,并且已经踏进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好时代。但这个时代却并没有向他们舒张开像他们所意想的那样热忱的双臂,岂止是没有舒张,新国家政权还紧急动用了它所控制的所有资源(从编民齐户到公职公薪;从刑罚体制到宣传机器),将其兜头拽入了一场灭顶之灾。此一事件,乃是知识分子之于革命、思想方案之于政治实践、个性之于群体意志,以及非延安谱系的革命知识分子之于延安革命者、文化人和文学者的天真无邪之于新当政者凛然不可冒犯的意气之间,一系列紧张、复杂关系的纠结,在新政权历史上的第一次骇人听闻的揭幕(相比较而言,稍前的电影《武训传》批判和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差不多称得上是和风细雨、温情脉脉了)。由于“胡风案”的牵连,燕郊先生与当年以思想才情的彼此吸引而相继聚集到胡风所主持的《七月》诗刊和《希望》杂志周边的众多师友一起,遭到新成立不久的国家政权的严厉摒弃,嗣后有将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名字进入另册。但即使是在一度锒铛入狱,无法笔之于书的时段,诗人依

然通过他自己称之为“心写”^{〔1〕}的方式,继续书写着自己内心的声音。这些“心写”的文本,“获释后默写下来,意外地保存至今”^{〔2〕}。由于机缘的辐辏,我是比较早地读到这批经由燕郊先生之手一遍遍默写下来的较为原始的稿本的读者之一。它们被用复写纸誊抄在日久年长已经泛了黄的、参差不齐的纸页上。在这之前,尽管已有一小部分,燕郊先生是夹在信函里陆续给我看过的,后来趁思和与李辉决定将他们合作主编的“火凤凰丛书”改由上海远东移师山东友谊的机会,我便征得思和的同意,将燕郊先生的这批文本作为丛书之一编入。一九九八年的春夏之交,当我收到燕郊先生打包寄来的《夜行》底稿,急急翻读一过时,心头依然一阵阵发紧。当时的感受,那份阅读时内心受到的冲撞和击打,我随后已写进《存在的勇气,或拒绝遗忘》^{〔3〕}一文,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参读,此处不再重复。《夜行》编印得相当马虎。山东友谊是家刚揭牌不久的出版社,也不知是编辑少经验还是怕麻烦,校样既未请作者斟定,当然更不会让我过目,结果付印后错字讹文历历在目。燕郊先生特地为我复写来整整四页的“勘误表”,计二百零九处之多。他在信中说,揆之新闻出版署有关书籍出错率标准,此书可以判为“废书”。好在时隔数年之后,作为思和先生当代文学史观中广具影响的“潜在写作”构

〔1〕 参见彭燕郊诗作《音乐癖》副题自注:“《往事如烟》是我在‘文革’期间写的一册诗稿,曾几次毁稿又重新默写出来。当时,写这样的诗是犯法的。这首诗是被‘群众专政’时写的,当然是‘在肚子里’写起来的。英雄们富于浓郁浪漫主义色彩的政治游戏是以我们这些‘分子’的身家性命作道具的。诗,只能写于不见天日之中。”(《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页48 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此处所讲的“几次毁稿又重新写出来”、“在肚子里”从事的写作,即为50年代的“心写”。

〔2〕 见《彭燕郊诗文集·诗卷(下)》后记,页356—357,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3〕 此文原为燕郊先生要我写的《夜行》的“序”,后以该题名先行刊于《读书》1998年第12期。

架的资料印证,由思和先生主持编辑的一套“潜在写作文丛”中,再度收录了燕郊先生的这批文本,取书名为《野史无文》^[1],一扫原先鳞次栉比的错讹,这才让我一直歉疚着的心稍稍得以宽释。

这批用“心写”的方式草成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特别是五十年代)的诗文本,向世人披沥了诗人是怎样依凭人的理智和良知,忍受肉体 and 人格尊严的伤痛和熬煎,守住一线文化命脉,拒绝放弃自己的精神存在的,又是怎样置身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强大压力之下,依然忠实于自己的内心的。他以个人的信念抗衡住集体强权的威慑^[2],在一个容不得个人精神存在的时代,有时不惜采用“佯狂”,即有意识的“装疯卖傻”外表下的“呵佛骂祖”,倔强地存在了下来。在一个举世正在准备或已经步向精神迷狂的时代,对人的尊严和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尺度的维系,只能从个人的救赎开始。

彭燕郊的这批诗文,与胡风先生写于狱中的《怀春室诗文》,绿原、曾卓、牛汉等后来被人辑录在《春泥里的白色花》中的诗文,阿垅的《垂柳巷文辑》,张中晓的《无梦楼全集》^[3],还有诸如聂绀弩的《马山集》^[4],荒芜的《纸壁斋诗集》等文本一起,揭示了那个时代精

[1] 彭燕郊:《野史无文》,陈思和主编“潜在写作文丛”之一,武汉出版社,2006年。

[2] “40年代末50年代初,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一样)很快就清楚知道我能够做、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交出去,同时也很快就清楚知道已经被‘交’到一个庞大无比的名叫‘集体’的机制里……”(见《我应该怎样想——一些原生态思想素材》,《野史无文》“附二”,页109—110,武汉出版社,2006年)。

[3] 上述文本均收入陈思和主编“潜在写作文丛”,武汉出版社,2006年。

[4] 1962年聂绀弩自北大荒返京时自编手抄的旧体诗集,收诗40首。翌年,聂把其中与北大荒有关的诗作抽出,加上补做的七律,共43首,编成手抄本《北大荒吟草》。而将“三草”(即《北荒草》《赠答草》《南山草》的统称)分别誊写成册则是1979年的事,1980年代初在香港铅字印出(见罗孚《聂绀弩诗全编·后记》,学林出版社,1992年)。有关聂绀弩旧体诗集的版本沿革,刘志荣:《潜在写作:1949—197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三编第一章“散宜生体”“附注”也有很好的说明,可参阅。

神和人格所应有的正直、高贵的水准。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那个就思想文化而言,正在完成它们驯顺于时代政治的脱胎换骨过程的年代,思想者的精神风骨才不至于全面沦丧殆尽。这些诗文的价值,首先还不在于它们所特有的诗性,而更在于其作为时代良知和风骨的标尺的意义^[1]。至于擅长见风转舵的舒芜,即使此前此后诗文才思如何出众,时过境迁之后又如何得到聂绀弩“错从耶弟方犹大,何不纣廷咒恶来?”^[2]诗句的怜悯,并且本人也多有颇费心计的自我辩白,但与历史耻辱柱紧紧维系在一起的命运,则是在他当初向“胡案冤狱”制造者主动辑、交经由其有意割裂和重新编排的师友间私人通信的那一刻起,就已被注定,并且永难改变得了的。

对燕郊先生此期的“心写”文本,我还想说,诗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家园”的无尽追怀,它同时也是必须深入到黑暗内部去做的一种工作。你能不能承受住内心的羞辱、厌恶以及噬心的伤痛,承担起命运对于良知的播弄和打击,以便最后洞穿它的荒谬?这将对诗人的现实感,构成严峻的挑战和考验。倘若你只会在这样的现实(不管是外在的还是内在的)面前背过身或蒙上脸,或者只会在这样的现实面前流露出踟躇、不安、尴尬,感到惊惧和畏缩,乃至陷入对

[1] 2000年,彭燕郊曾在鲁贞银博士论文读后感中,再次郑重表达了对胡风“义无反顾地以生命为代价沿着‘五四’——鲁迅开辟的道路披荆斩棘往前走”的敬重,对其“通过对鲁迅的理解升华为现实战斗精神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理论体系”的敬重,并不以胡风未能成为“纯粹的学者”或“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遗憾,但也心有不甘地承认胡风也有“缩小了鲁迅精神而不是发展了鲁迅传统”的一面(《世纪之痛的沉重课题——读鲁贞银〈胡风文学思想及理论研究〉》,转引自《彭燕郊诗文集·评论卷》孟泽“序”第四节,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年)。

[2] 聂绀弩1982年4月写的《重禹六十》(舒芜原名方重禹)“之二”中的句子。同年9月3日聂致舒芜信云中云:“……然而人们恨犹大,不恨送人上十字架的总督之类,真是怪事。我以为犹大故事是某种人捏造的,使人转移目标,恨犹大而轻恕某种人。”见《聂绀弩诗全编》笺注,页218—219,学林出版社,1992年。